



新华社图片

以互联网贷款为抓手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黄剑辉

破解难题的新抓手

小微企业是提升经济增长、拉动社会就业和促进创新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却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并对企业发展造成极大阻碍。在我国，近年来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201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等“几家抬”的办法，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运用，改造信贷流程和信用评价模型，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贷款发放效率和服务便利度。通过发展互联网贷款缓解小微融资难问题，正是对相关要求的落实。

互联网贷款是依托于互联网新技术以及金融科技、聚焦于长尾客户金融需求而兴起的一种新型信贷模式，目前主要应用于消费贷款和小微贷款，其在解决传统融资模式中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中小微企业信贷审批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银行为客户提供面向小微客户的互联网贷款服务，这些机构多依托自身电子银行、直销银行及电商平台等入口，着力搭建场景，吸引有借款需求的客户。

从狭义角度上讲，互联网贷款可特指纯线上信贷产品，这虽然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但从目前各行对于纯线上小微贷款

近年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日益兴起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利用大数据技术等金融科技手段，为解决传统小微信贷业务中的痛点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的实践来看，大多处于相对早期的探索阶段。更为广泛的探索则是在线上线下结合的产品及业务模式方面，各银行的创新更具特色，通过在目标客户恒定、产品精准营销、客户额度审批等贷款产品核心处理流程中充分融入大数据分析应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传统小微贷款业务中存在的诸多痛点，从而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针对性举措

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小微信贷业务，但传统的小微贷款业务存在诸多方面的痛点，互联网贷款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痛点。

第一，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银行可以更容易获取小微企业的各方面数据，并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对收集来的碎片化信息进行关联分析、交叉检验及信息核实，从而对企业的真实面貌进行全面刻画。通过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辅以其他手段，基本已能做到在线的身份认证。同时，通过加强与大数据征信机构的合作，也可建立小企业失信披露机制，预防重复骗贷现象发生。

第二，通过实时在线监测解决贷后管理问题。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在线7×24小时对客户的行为数据进行采集，对借款人进行全面持续的风险监测，一旦发现任何风险迹象，及时通知相关业务部门提前采取风险防范应对措施。尤其是在电商平台+企业信贷模式下，借款人在整个供应链上的资金流动全在平台的掌握之中，借款人的需求是否真实、还款能力是否足够，到期时点该客户是否有足够资金还款，均可通过对数据的处理计算准确推断。

第三，线上引流精准营销解决获客留客问题。一是通过与政府职能部门、支付结算机构、核心企业等的合作，利用其网站、APP等

线上引流，其中尤属与税务机关或代理报税机构合作开发的产品最为成熟。二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小微融资需求进行前期预测，主动寻找潜在客户，并通过合适的渠道精准营销。三是通过区分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为小微企业提供精准金融产品服务及配套产品，不仅使营销更加便捷，也能极大提升客户的黏性。

第四，优化信贷流程解决单位成本偏高问题。一是操作在线完成、审批在线自动处理、风险在线自动预警的操作模式，大幅降低借贷双方的操作成本。二是数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商业银行可以较低成本获得小微企业及个人沉淀在移动支付端、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海量“软信息”。三是利用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对碎片化的信息进行反复推演和提炼，从而加快审批流程、提高审批质量、降低信息处理成本。目前多行可实现审批按秒计、放款按分计。

第五，依托大数据信贷决策解决操作风险问题。大数据信贷决策采用云计算技术，从数据收集录入到评价结果输出，整个过程全部由计算机算法完成，减少了人为主观判断，不仅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也有助于防范操作风险。而通过在传统建模技术的基础上采用机器学习建模技术，则可进一步提高模型运作的自动化程度，减少人为干预对模型输出的影响。目前较为先进的大数据决策模型已能覆盖贷前贷中贷后的客户全生命周期管理。

优化产业政策 促进结构性改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吉嘉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形成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当前重要课题。中央财经委员会近期指出，我国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应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形势下，应该做好顶层设计，打造可以支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现代化产业链。优化设计产业政策应促进结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经济全面振兴。

供给响应机制失灵

长期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优化，而结构优化包括在科技领域不断创新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将传统经济活动所占用的资源转移至代表更高生产力的新经济领域、根据战略需要培育支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产业链。不过，依靠市场自适应调整的结构进化过程往往充斥着市场失效现象。

发展新经济企业要面临几项挑战。一是产业发展壮大需要金融支持，但是缺乏业绩记录的企业容易被市场认为风险过高，使得投资方望而却步。

二是企业需要产业周边服务和原材料，但是可能缺少稳定的供应渠道。

三是企业培训或引入相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需要在早期投入较大的人力资源成本，但是员工可能会流向竞争对手或通过自主创业进行模仿复制。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有关融资、产业链和自主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产业政策解决，新经济难以进入良好的发展状态。这些制约市场自适应发展的现象可被称为供给响应机制失灵。

清除产业链发展障碍

虽然有市场失效问题的理论依据，现实中的产业政策影响在国际上仍富有争议。国家干预产业经济的批评意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机关能否获取足够的信息去辨别受到市场失效影响且拥有优质潜能的企业，并在宏观层面合理布局。二是政府机关能否在企业的各式游说下保持公正，并切实防止产业政策沦为别有用心者的寻租工具。实际上，政府市场干预行为需面对信息缺乏和寻租这两种风险。

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报告表明，产业政策对许多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低成本贷款、国有企业控制、出口扶持以及科技转移等方面的产业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相比之下，在拉丁美洲所推行的，基于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产业政策却普遍不尽如人意，基本无法给其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多样化带来明显帮助。

美洲开发银行对拉美国家的产业政策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运用科学的模型和推理，深入分析了政府干预私人部门产业发展的影响。总结发现，政府应加强与私人部门合作寻找约束企业发展的瓶颈，并以公私合作的模式为基础制定政策，清除产业链发展的障碍。根据相对成功的拉美国家经验，设计合理的公私合作模式可帮助消除信息缺乏和寻租的风险。

遵循三项原则优化政策

产业政策有较强的理论支撑，但是实施中确实存在风险，在不同国家实施的影响效果也大相径庭。总结国际上的相关实践经验，产业政策的优化制定方案应当遵循三项基本原则。

首先，阻碍新经济健康发展及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应在市场中得到广泛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传统的政策制定过程习惯使用自上而下的模式——由政府统一制定规则，使市场参与各方有动机为优化社会整体利益而行动。自上而下的模式要求政府在宏观层面掌握足够的信息，优势是减少私人部门寻租行为的干扰，确保政策制定的独立性。然而，从目标设定、工具选择到执行空间，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多元化的信息，所以政府与市场间的充分讨论和信息传递可以增加政策成功的概率。应建立专门收集信息的合作机制，促使政府与市场共同探讨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制定最有效的干预措施、进行周期性绩效评估并及时更正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应建立产业政策委员会统筹负责合作机制，并鼓励市场创建行业发展论坛、行业投资协会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创投基金等。合作还可以帮助政府了解私人部门在相关政策实施后的投资意向。税收减免、研发补助、信贷优惠等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实施应在实际合作过程中决定并调整完善。

其次，应完善奖惩体系。根据东亚与拉美的发展经验，奖励与惩罚机制的平衡非常重要。我国台湾地区的税收减免和韩国的信贷补助政策都要求企业至少达到合格的绩效标准。不达标的企业将被取消政策支持并可能附带其他惩罚。同期在拉丁美洲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也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大量贸易保护及信贷方面的优惠，但是缺失一定的惩罚机制。现实证明，该区域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帮助了许多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因此，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应该鼓励产业链发展壮大之外，及时清除失败的投资项目，形成完善的新经济发展试错机制。

第三，建立完善的问责机制。应当明确产业政策的最终受益方不是区域政府机关，也不是相关领域的企业，而是社会整体。产业政策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公众应当了解政策向特定企业倾斜的基本原因。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的各级金融及开发机构应确定客观量化的工作目标，例如新经济领域研究课题数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总额、失败项目撤销数量等。各相关机构应定期公开绩效报告，负责对偏离既定目标的行为做出解释。企业向政府提交有关政策支持的申请应该被列为公开信息。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应向全市场保持开放，防止政策优惠被既得利益群体垄断。

“房住不炒”需要长效机制提供有力保障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规划研究部资产配置处处长 侯方玉

促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均等化

“房住不炒”的理念，是房地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性指针，也是避免经济过度依靠房地产行业的内在要求，具有战略性意义。要落实好这一理念，需要加强长远机制的设计。因城施策，通常采用提高首付比、利率等金融工具限制及本地户籍、持续缴纳社保等带有较强的行政性规定，此类政策短期见效快，但并非长远的制度安排。如因城施策的城市不断增加，政策性的碎片化问题会逐渐凸出。一旦遇房价下行幅度加大、土地财政问题不断暴露等困境时，政策可能会反复。如何使“房住不炒”理念更好地持续贯彻，关键需建立起长效机制。

笔者认为，建立长效机制应从供需层面入手。在供给层面上，应在不同区域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均等化。实证研究表明，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优劣，而非其建安成本加折旧。公共产品是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

英国经济学家蒂伯特首先从理论上推导出，人们更愿意迁往具有更好公共产品的社区。后续的研究者将蒂伯特提出的假设条件放松，更接近实际，如人们需要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并将社区扩展到地区甚至是国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收入相同甚至略低的情况下，人们也更愿意迁移到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地区。

当前我国区域间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差距明显，相比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优势明显，典型的如北京、上海拥有更好的公共产品，更好的基础设施、教育与公共医疗等。结果是更多的人迁移或选择在这些城市居住，推动住房需求扩张，房价上涨。因此，政府应该着力推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各个地区的公共服务产品均衡发展，从而引导生产要素的发散流动，减少一线城市住房供给

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增长趋缓态势下，我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仍坚持“房住不炒”，继续“因城施策”，从银行房贷和购买资质要求等方面持续限制，逐渐改变了以往经济下行就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市场预期，抑制了投资性与投机性资金涌入房地产。随着调控政策的延续，市场对摆脱主要依靠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路径、实现经济转型的信心逐渐增强，也为发展股权投资创造了条件。

引导资金分流

我国储蓄存款规模较大，其中居民存款中有不少长期性质，如有符合长期性质的产品设计和利益一致性原则，自然可引导部分资金进行权益类资产投资，从而减少对住房投资的需求。

在引导资金分流层面，需提升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化、专业化和多元化水平，以实现各类投资产品保值增值为首要考虑，为吸引长期资金开展权益投资创造条件。目前国内从事二级市场证券投资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基金数量不断增加。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公司124家，公募基金资产合计13.46万亿元。但穿透到众多产品中，在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缺乏明确利益的一致约束。而在管理费提取上，无论产品盈亏，都按比例计提。其结果容易导致管理人重基金管理规模，甚至不加约束地扩大基金品种和数量，轻投资人回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经济有其周期性特征，资本市场是各类经济的集合映射，也相应具有周期性特征。由于随众因素，普通投资者易受市场情绪影响，在市场大幅上涨时更倾向买股票型产品。即使管理人判断出市场泡沫严重，但在管理规模扩大、收取的管理费也相应增加的激励下，他们仍会鼓励投资人购买产品，而不是从价值投资的理性角度引导。

在针对机构的产品设计上，股票型产品的投资基准倾向于绝对收益型产品，如1年、3年和5年投资收益率硬性要求达到多少，这实际偏离了对股票市场风险收益特征的理解。长期看，股票投资收益率会高于债券型产品，但其不确定性也强，考核基准如以绝对收益作为要求，容易扭曲管理人的投资行为，注重短期效应，忽略长期投资价值。股票型产品应以战胜相对基准才有可比性，设计相对收益型产品作为投资基准来衡量管理人的投资能力。较长时期如3年战胜了投资基准，说明管理人能获得超额收益；低于基准，说明管理人投资能力较弱。此情形下，投资人可投资被动指数来获得市场平均回报，从而节省管理费用。